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当代革命

〔英〕拉斯基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当代革命

[英]拉斯基 著

朱曾汶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当代革命/(英)拉斯基著;朱曾汶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6689-8

I. ①论… II. ①拉… ②朱… III. ①政治—
概论—英国—现代 IV. ①D7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853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当代革命

[英]拉斯基 著

朱曾汶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689-8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½

定价:48.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悉,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6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五辑印行名著 6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六辑、十七辑,到 2018 年年底出版至 7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译者前言

《论当代革命》是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1893—1950)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43年,到1946年,仅战时发行的所谓“经济版”就销了四版,是拉斯基著作中销行较广、影响也较大的一本,被美国《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列为拉斯基的代表作。同时,从这本书所阐述的理论和立场观点来看,也最集中、最露骨地反映了拉斯基的思想全貌,可以说是集拉斯基后期的反动思想的大成。

拉斯基写此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那时法国败降,英国面临德军进攻的危险,正处于生死存亡千钧一发的关头,国内的阶级矛盾由于强敌压境而暂告和缓,出现了“举国一致”御敌的虚假局面。统治阶级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不得不向人民做一些微小的让步。就在这种情况下,拉斯基提出了他写本书的主旨,那就是:从战争开始到胜利结束的那段时期,是实现改革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战争的压力下,可以不经过剧烈的内部冲突就实行种种根本改革。

然而,凡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拉斯基的这个“主旨”是建立在多么荒谬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战争时期,英国的生产关系不仅没有丝毫有利于人民的改变,而且战争的需要反而使生产大权更加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手中。在这种

情况下,鼓吹统治阶级会同意实行损害他们根本利益的改革,那只能是欺骗。

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同意的革命”。拉斯基最害怕暴力的革命,认为一使用暴力,民主和自由就没有了,而他心爱的社会秩序也就完蛋了。所以他拼命诋毁伟大的十月革命,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描绘成一个恐怖世界(这一点在拉斯基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时代的难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同时刻意抬出一个“同意的革命”来与十月革命相对抗。所谓“同意的革命”,概括地说,就是“用和平方式、以协商而不是以暴力来改造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在“各阶级人民充分合作”和“一致同意下重新确定共同的伟大生活目标”。这种“同意的革命”由谁来领导呢?统治者!因为拉斯基自己说,如果领导人不利用人民要求重新确定国家目标的激昂情绪,就是怯懦,子孙后代不会饶恕他们。“革命”而竟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同意,由统治阶级自己来领导和实行,这不是荒乎其唐的奇谈怪论吗?

因此,究其实,所谓“同意的革命”,主要是站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立场上,为统治阶级说话,维护现实的统治。显而易见,拉斯基的真正意图,只是想实现一些温和的社会改革,企图给人民一些小恩小惠,借以麻痹他们的革命意志,使他们甘愿做资本家的忠顺奴仆。他在书中强调说:“从历史意义说,对付革命的威胁只有一策,就是实行革新,给人们以希望和鼓舞,不然的话,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段话,也就是拉斯基的“理论”的全部奥秘了。

总之,《论当代革命》用了大量的革命词句,掩盖着反革命的真

面目。拉斯基主张战后的世界应由英、美两国来共同领导；更异想天开地建议到中国全境进行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而美其名曰“帮助开发落后国家”，于此，他的帝国主义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予以严肃的批判。

本书是根据美国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 1943年版译的，但曾根据英国乔治·艾伦和昂温书店(George Allen & Unwin) 1946年版校正。

译者

1964年9月1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论时代精神	4
第二章 俄国革命	44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的意义	98
第四章 陷于困境的民主国家	150
第五章 民主的内在条件	193
第六章 国际形势	247
第七章 反革命的威胁	305
第八章 计划化民主国家中的自由	371
译名对照表	448

序 言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应大大归功于我的朋友们，特别是归功于在克拉克森大街 17 号所进行的那些无穷的辩论，在那里，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同居的疏散者们和我逐点地讨论了本书的各种问题，直到听了午夜的新闻，我们从分析原则转到估计局势为止。其次，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我的学生们也有不少功劳，他们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研究班里力图了解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东西以及怎样才能使后代的学生免遭战争的灾祸。书中很多地方是由全国各地的工党会议上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批评所决定的，还有就是我在兵营和飞机场所做的讲演，在那些兵营和飞机场里，陆空战士们的坚决诘难使我懂得，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如何成了一件不可战胜的工具，一支有思想觉悟的军队。我还要补充说，本书相当一部分理论乃是我国每一个公民在闪电战期间成天目击人民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刚毅精神时以及看到俄国人在一次仿佛几乎使文明灭亡的威胁面前所做的英勇卓绝的抵抗时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的产物。此外，我还留心观察了罗斯福总统怎样巧妙地教会美国人民懂得他们只有为自由服务才能够当家作主这一教训，这自然也使我得益匪浅，但愿我没有误会他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使问题的性质昭然若揭之前那么出色地与之战斗的反对派的重要意义。

我必须指出我从 E. H. 卡尔教授的著作,特别是从他的《和平的条件》一书,还有从马克斯·勒纳教授、伦纳德·胡尔夫和金斯莱·马丁的著作中学会了多少东西;其次,从我同我的朋友路易·列维、安德烈·拉巴特和费利克斯·格旺的谈话中,我也懂得了不少造成出卖法国的原因以及法国将据以革新它的人民曾大力帮助形成的文明传统的那种精神。

本书开始写作于战争的第二个月,完成之日,议会刚开始讨论复兴问题,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关于社会服务的报告至少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准,我们可据以判断英国政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真正打算使四大自由成为下一代的部分遗产。对于书中所写的一切,我只消补充一句:在我看来,威廉爵士的精辟分析的全部主旨加强了本书所做的结论,即我们必须在从现在到取得胜利为止的这段岁月内做出重要决定,我们能否用胜利来实现伟大目标就要以这些决定为转移。如果我们等到胜利以后再来选择,那就会把历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付诸东流。

我把本书献给两个朋友,这些年来,我曾经和他们在一起度过许多忧愁和欢乐的时刻。我要特别着重说,我们的国家对 E. R. 默罗先生感恩不尽,我知道铁钦纳先生是不会有异议的。从战争爆发以前直到现在,默罗先生孜孜不倦地做了只有勇气和正直才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使他的美国同胞对我国所发生的事情有深刻的了解。不少英国人从他对我国人民的忠实和信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坚持到底和希望的力量,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最后,和过去一样,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如果不是得到我的妻子的帮助,这本书就完成不了。其他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因为她

不会允许我多说。但我至少可以记下我的一点体会,那就是:患难相共,情爱弥深。

哈罗德·J.拉斯基

1942年11月27日于

埃塞克斯,小巴德菲尔特,庄园别墅

第一章 论时代精神

一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它也许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最深刻的一次变革。除非我们承认它实际上和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宗教改革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时期或如在 1789 年中产阶级引人注目地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时期同样重要，那我们就将无从理解它的本质。

这不是一次由思想家们制造出来的革命，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曾预知它的到来，甚至画出了它的方向的巨大轮廓。这也不是哪一帮政治家们一手造成的革命，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曾有意无意地加快了它的到来，助长了它的声势。它的本质，恰如它的不可避免性一样，在于使我们的社会具有目前的性质的那一切事物。我们当然能够觉察它的到来并为其做好准备；如果那样，我们就能够建立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和牢固可靠的文明。要不然，我们也可以拿定主意打退它；如果那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以为我们这代人宁肯抗拒时代的潮流而不敢违抗人的法令了。

在每一个革命时期，实行基本改革总免不了要发生瓦解和冲突；而且这些瓦解和冲突总是被归诸坏人的一意孤行，而不是归诸

那些较深刻的客观原因,这些原因是坏人所掌握不了的,而且坏人只不过暂时体现了它们而已。同样,我们总是不肯动脑筋去找出那些客观原因,却一味寻求某种现成的和不三不四的药剂,这种药剂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会把疾病的那些明显的和更痛苦的症状暂时掩盖起来。从《凡尔赛和约》迄 1939 年 9 月 3 日^①为止,“après nous le déluge”^②一直是英国每一任首相的座右铭。他一直满足于喊几句有魔力的口号,其实他却至少应该实施无情的诊断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疾病的性质之后,才能够担负起治病救人的艰巨任务。

据说,我们时代的毛病,是出在坚持已经过时的国家主权原则上面;如果政治组织单位和经济生产单位取得一致,我们就一步登天了。也有人说,救治之道在于改良教育;据说,我们是在训练我们的人民在一个垂死的世界里生活,而不是设法训练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到那个挣扎着要诞生下来的世界上去生活。有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使人们了解他们的遗产的意义,一种更新更好的精神就会统辖人类的命运。另外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病根在于宗教精神的衰退。他们断言,不恢复信仰,就无从确定文明行为的准则,只有这种准则才能在人们中间维持一个文明的目的。还有人以为,“ne pas trop gouverner”^③这句著名格言是我们获救之道;我

① 按这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对德宣战的日子。——译者

② 法文“在我们身后,管它洪水泛滥!”这句话相传出于荒淫无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之口。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一面是宫廷中的穷奢极欲、歌舞升平的生活,一面是战火四起,民不聊生。这句名言深刻地暴露了他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译者

③ 法文“别管得太多”。——译者

们的病根在于政治家们过分热衷于控制国家的每一部分。只要政府重新恢复商人做买卖的自由,我们就能进入一个创造性的新时代,战争和不安全都能永远消除了。

当然,上述这些救治方案,每一种都有点道理,尽管它是片面的和支离破碎的。诚然,一个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从战略意义上说,是和世界市场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它为了自卫,不得限制世界市场由于其固有性质而提供给我们的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在经济方面,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使我们重新犯下重商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显著错误,从而当我们的机器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为丰富产品订计划时,反而订出了限制性的计划。但是,订限制性的计划就是奉行一项必然不利于我们邻邦的政策。邻邦一定会抵制,而且,如果力量够得到,也一定会千方百计把它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是,从主权方面说,如果它们力量够得到的话,它们使用的手段就不外是以战争相威胁,或者真正动手打,这样一来,那些把国家主权原则和战争联系起来的人,就有了有力的例证了。

然而那不过是一个片面的例证而已。因为,即使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外部压力由于取消国家主权而告去除,罗马和美国的历史仍然清楚地表明:在没有其他基本改革的情况下,内部压力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将导致深刻和剧烈的冲突。毋庸否认,一个没有主权国家毒素的世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比我们目前的世界强。但它仍旧没有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重要问题,仍旧要去决定把它的力量用在哪些目标上面。

我们需要更多地和更好地适应于现代特征的教育。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公民观念,就不会否认这种需要。我们人口的绝大部

分是和我们的文化遗产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活在世上根本不知道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势力,在危急关头,他们很容易就上了随便哪一种大事宣扬的骗人政策的当,只要告诉他们毛病出在哪一个人或哪一帮人身上,他们马上就向那个人或那帮人开火了。他们几乎没有受过训练来明明白白说出自己的要求。他们浑浑噩噩过日子,那条把他们的心理习惯同那些统治他们的人分隔开来的鸿沟,意味着他们彼此间多半不能互相了解。

可是,新的教育精神并不是一个和物质环境无关的因素。人们不能指望它在真空中实现。他们必须准备承认缺乏这种精神所引起的弊害,而具备这种精神后所带来的改革又必须保证能受到欢迎。这种精神之所以迟迟没有产生,是因为恰恰在这两点上存在着疑问。既得利益蓄意要使愚昧永久保存下去,而愚昧却正是我们文明的痼疾。除非我们决心向既得利益进攻,就无法摆脱愚昧;而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们着手进攻的话,既得利益是会顽抗到底的。

宗教精神的衰微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如果想恢复宗教信仰,就必须郑重其事地给我们所用的名词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如果我们指的是恢复对神的信仰,那么事实证明,特别是在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教义形式方面,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们那种提出合理凭据来证明自己确有资格被信仰的能力,正随着人们对宇宙的科学了解的每一进展而愈益削弱。此外,在人类经验中,没有一种残酷的方式是宗教精神所适应不了的;有人指责教徒们,基本上一直满足于眼看宗教对人民起鸦片烟的麻醉作用,这种指责是很有道理的。还有,人类知识中任何一种伟大的进展,都遭到过古典宗教的竭力反对,直到这种进展的真理如此明显,非想出某种羞答答的

通融办法来不可。如果宗教精神指的是某种宗教教义影响常人的社会行为的能力,那么对这种主张的回答很干脆:他们作为教徒的行为假使不比一定时代中一般人的行为坏些,至少也不见得好些。

但如果宗教精神指的是坚持人们除了个人满足之外,还要献身于一个目的,那么回答肯定是:当代一切伟大的运动都能激起一种以宗教精神为主的为事业奋斗到底的品质。我们无论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好,研究使中国和印度、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复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好,必然会发觉使这些运动能够存在的根源都不外是:尽管它们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它们却能够博得人们的热烈信仰,使人们发挥一种极端大公无私的精神,这种能力始终是一切宗教获得成功的秘诀。除了在这一意义方面之外,宗教精神的衰微是各种历史原因的自然结果,现在已不可能大规模地加以改变。

当然,除非是世界重新退回到各种野蛮势力互相角逐的混乱时代。它可能会这样;那时候,一小撮信徒就可借助于五花八门的神秘教来逃避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罪恶,这些神秘教的真相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它们的意义的人才会明白。但如果我们的世界能够为它自己安排一种有秩序的合理生活,问题就在于怎样去设法利用各种伟大的宗教总是能够释放的感情上的力量,使之成为那种有秩序的合理生活企图实现的目标服务。一句话,那些在历史上著名的宗教的信徒们所觉察到的衰微,乃是正在进行着的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一切政府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用敌对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我们所能预知的一切情况下,政府

的存在乃是和平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所谓我们被政府管得太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的论调，却是叫人难以容忍的。只有在一个其基础为人们一致同意，而经济又普遍相当稳定的社会里，管得少些才意味着自由多些；在一个对其基础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同时又存在着以大量失业为例证的经济不稳定的社会里，只有对那些掌握着经济命脉的人，管得少才意味着自由。

那些攻击政府干涉经济领域的人往往忘记了，实行干涉主要是由于体会到过去缺乏这种干涉所致。我们所知道的控制，无论是在劳动条件方面、证券市场发行证券方面或者营造权方面，都是出于私人利益自由竞争从未导致过良好社会秩序的经验教训。这种情况可能被掩盖相当长一个时期，例如当美洲大陆的广大资源破天荒第一次被机器操作开发出来的时候；但是，一旦社会成熟了，像别处一样，那充满机会的国土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就成了失败的国土，除非我们能控制住那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使它为一个一致同意的社会目标服务。商人们曾有过整整一个时代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为社会目标服务；即使今天，除苏联之外，商人仍然绝对是国家机器的主人。然而，在这个时代，他们的那种使人民相信他们要求不受政府管束是对人民有利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显著地削弱了。

商人们从来不埋怨旨在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干涉；关税、津贴、出口奖励、特种信贷，只消举出少数几个例子就够了，他们是绝对不会不赞成的。商人所反对的干涉，不是企图给消费者以保护，就是给劳动力市场中的非特权阶级以保护。为了反对这种干涉，商人们乞灵于那些“经济法则”，而且由于醉心自由，竟把它们和自